

新世纪文丛

泥泞的坦途

周政保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3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

ISBN 7—5419—1945—4/I·76

定价：4.15元

《新世纪文丛》序

当九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抖去八十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向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十年，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十年。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开

放”，世界各地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十年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敢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年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如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十本小书，有九本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那怕它还不很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陶金。诚然，各书作者之间

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位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省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十年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种种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和玷污。人们完全可以从梳理问题的角度，对十年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傲。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九十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八十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和滋养，让“新世纪”文学百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迎接二〇〇〇年的到来！

1990. 春.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阐释的可能性

第一节 文学判断的
“困境” (3)

第二节 角度与方式
的选择…… (8)

第三节 阐释的若干
前提…… (17)

第二章 理解的背景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
主义的现实主义
观念…… (29)

第二节 苏联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
的变迁…… (41)

第三节 风风雨雨的
中国革命现

实主义…… (52)

第三章 回顾与梳理

第一节 无可回避的
“革命功利
主义”…… (73)

第二节 真实性：稳
定而摇晃的
原则…… (87)

第三节 人物刻画理
论与“典型
观”…… (99)

第四节 “英雄”与
英雄主义精
神的描写
…… (110)

第五节 特殊收获：
“中间人物”
的光彩…… (120)

第四章 新的创造与 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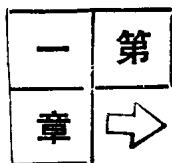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作为转机的
复苏与“舒
展”…… (133)

第二节 从创作方法
到审美精神

	的潜移……	(142)
第三节	描写的此岸 性与表现的 彼岸性……	(154)
第四节	诗化：写实 与象征的和 谐……	(164)
第五节	“故事”与 模糊的寓言 倾向……	(174)
第六节	“寻根”： 现实主义精 神的实验	(185)
第五章	中国当代现实主 义小说的前景	
后记	……	(209)



阐释的可能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第一节 文学判断的“困境”

无论我们站立在怎样的国土上，也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时刻，文学的判断都将是一种尴尬的行为。过去曾有这样的说法：即以为文学史的阐释要相对自由一些，而估价或评说正在迅速变化着的文学现象要艰难一些，原因之一就是眼前的文学判断总是牵连着各式各样的“利害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起码是一种不甚完整的见解。我不想否认“利害关系”的客观存在。但也可以假定，倘若这种生命力很脆弱的“利害关系”消逝了，文学的判断就会容易么？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感

到，只要我们（不管“我们”之中的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所面对的是文学，都可能陷入判断的“困境”。而且，越是真切而企图体现文学“特质”的判断，或者说，越是富有文学性的判断，陷入“困境”的程度就可能越深。倘若有人以为文学的判断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或以为可能达到法官一般的果敢与可靠，那不是判断者的愚昧无知，就是文学自身的可悲可叹了。

当我们判断历史的或现实的文学现象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是在运用一种标准，一种尺度，一种早已存在的参照，一种期待的心理总是左右着判断的磁场。这一点，我想谁都无法避免。

诚然，具体的文学判断往往是一种相当偶然的审美现象，它类似于小说家于某年某月的某种特定心境下创造一部具体的小说，但这种偶然的表象之下又包含了巨大的必然性：判断者只可能这样“判断”，而不可能那样“判断”。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判断的标准（或尺度或参照）的强大作用，就在于相应的期待心理指向的微妙性——这些也许很明确，也许是无意识的结果。

文学判断的标准，以及对于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所持的期待心理的指向，构成了一个文学判断者的文学观念的最重要的内容。不言而喻，这仅仅是对于文学判断的一种尚未与实践挂勾的理论抽象。但我以为，这种文学判断的内在程序的明晰化，至少可以否定那种判断趋于绝对的倾向，或者说，可以给各式各样的文学判断留下回旋的余地。因为，我在这儿指出的“判断程序”之中，包含了相

应的判断标准（或尺度或参照）及期待心理的指向的重要环节，而这一环节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判断的质量。

谁能以为自己的文学判断标准或文学心理期待就一定体现了“绝对真理”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常常把我们的文学判断或文学批评推入尴尬的“困境”。但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种“困境”所显示的信息，恰恰标志了文学理解的进步，而不是理解的走投无路。

我们应该容忍各式各样的文学判断。而这种“容忍”则意味着判断标准与期待心理指向的多元性及合理可能。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文学判断的事实——就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于莎士比亚的推崇，并不影响欧美中产阶级作家或文学批评家对于莎士比亚的衷心钦佩一样——尽管这方面的推崇或钦佩依然显示着各自的特别性与互相之间的差异。但这样的事实至少说明了：在文学判断的历史的或现实的进程中，必然也存在着多元性的、也是合理的阐释途径，而不同的途径也可能抵达共同的——肯定或否定的彼岸。

在文学即将面临二十一世纪挑战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一种重要现象是，伴随着文学发展的多元局面的出现，文学判断的标准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那种井蛙观天似的固守一种判断标准的堂·吉珂德式的做法，是解释不了文学的，也是难于丰富文学发展的理论的。

在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著者曾从“修辞关系”、即小说艺术中的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

间的关系角度出发，颇为客观地描述了四个方面的所谓“普遍规律”：“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是客观的”、“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感情、信念和读者的客观性”。毫无疑问，布斯于小说修辞学意义上概括的所谓“普遍规律”，就是一些通常被人使用的判断小说艺术的“标准”，或者说是一些判断者的小说期待心理内容：“真正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于是便有了这些“普遍规律”的诞生。不过，冷静的布斯并没有全部肯定这些“普遍规律”的有效性。他仅仅揭示了文学判断的事实。而这方面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的文学判断更接近事实求是的理解。我们可以不接受某些文学判断的“标准”（如那种“真正的艺术无视读者”或“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之类的“普遍规律”），但可以承认其特定景况下的合理因素。

文学作品的阅读总是呈示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程序：阅读的结果不能不是一种作品被“改写”的结果，当然也可以说是对作品的感受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阅读者的某些文学观念或某些判断标准或某些心理期待，参与了这种“改写”的程序——于是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结论：在苏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从否定到肯定的艰难旅程，但八十年代的《日瓦戈医生》依然是五十年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部《日瓦戈医生》。文学的判断就是这样不可思议。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也曾以自己的特别方式发生过。当然，谁也不必回避——其中所渗透的或直接介入的

政治力量及文学政治学意识的强大作用，但同样不必回避——文学判断过程所可能包含的政治因素：这同样很正常（只要我们不是那样天真或那样书卷气）。特雷·伊格尔顿在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的《结论：政治批评》中说：“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证明，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

的确，文学判断不仅仅是文学的判断，因为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检证判断者世界观的角度或场所——显然，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文学知识问题：纯粹的文学性判断几乎是一种学术神话。我很相信特雷·伊格尔顿的这方面的判断，尽管他只是英国的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政治信念与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的渗入或介入文学判断，应该认为是一种“正常态”。然而，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渗入或介入，而是以怎样的政治信念与怎样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渗入或介入本应呈示“正常态”的文学判断程序。在这里，以怎样的方式渗入或介入也可能成为某种社会文明程度或文学政治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事实上，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考内容。

在文学的判断结果方面，判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冲突所隐藏的“困境”，必然使整体的文学判断趋于清醒与理智，因为这种“困境”只是判断标准的多元性

所致，而不是文学创造本身的“困境”。所以我说，历史是最富有说服力的明鉴，而所谓的历史循环论也是一种神话：历史不可能重复。譬如说，我们已经不再提“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我在这儿所说的“困境”，仅仅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描述了文学判断的复杂性与多元的判断“标准”及“期待心理”所带来的不易全部把握的实际景况，以及由此而应该具备的容忍各种充满了合理因素的文学判断的豁达态度。而且就象我在前面说到的“困境”所标志的只可能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第二节 角度与方式的选择

文学是人类思维的果实，而一部具体的小说，则是一种个体创造的精神产品。同样，文学批评也只能是具体的批评家的主观世界介入之后的判断。当然它首先是审美的，否则就不是文学的批评。

文学批评的主观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但审美的文学批评是否可能具备某种客观性呢？严格地说，纯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不过，倘若我们能够选择一种适当的审察角度，或操持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批评方式，那就可能出现接近“客观性”的奇迹，或者说，这样的文学批评在说

服力方面也许具备某种优势。

批评的选择性给批评家提供了一种富有“困境”意味的场所：即选择什么或不选择什么。批评的选择包容了批评的全部方面，譬如批评的角度与方式。

角度与方式的选择之于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所谓的“中国当代小说”，究竟是些怎样的小说？它的主体构成是什么？小说的创造与时代的文学思潮具备着怎样的关系？而这里所说的“文学思潮”又是什么？等等。这样也就不至于选择某种西方小说理论的角度来判断中国的当代小说创作了，因为操持某种西方小说理论、特别是现代主义小说理论的结果，完全可能导致中国当代小说的被全盘否定。譬如作为小说批评的尺度，奥尔特加曾说：“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的，这是就它的不真实而言的。”他又说：“在审美上，眼泪和笑声都是欺骗。”这无疑是说，小说自身的情感与小说读者的情感的介入都是多余的。倘若我们选择这种小说理论的角度来评价或分析中国的当代小说，其结论必然是相当滑稽的，也是相当严峻的——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象奥尔特加这样持小说叙述的客观性理论的小说家或批评家，在西方的小说世界中占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审美理论方面也具备相应的合理成份，但当我们面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主流、尤其是新时期以前的小说的时候，这样的小说理论及文学判断角度只能暂时搁置一边（但不妨碍局部的运用及由此而发生的启示性）。

当然，作为文学批评的试验性探索，我们也可以做诸

如叶嘉莹的《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之类的文章，但这类文章的主要倾向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发挥，而不在于“史”的评价。如果我们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硬要作出中国的古典诗词“早就是现代主义”的结语，那就显得牵强附会了；相反，倘若以“现代观”而导致中国古典诗词“不值一提”的判断，同样也是不切合文学史的实际的。

文学批评角度（或理论操持）的选择，不能不讲求它的有效性——鉴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体上遵循的是“现实主义”这一审美范畴——尽管“现实主义”常常被作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常常在“变化”中显得模糊不清，甚至常常被误会、被歪曲、被实用主义或极端的功利主义所窒息——但举着“现实主义”的旗帜却是事实。虽然，我们的“现实主义”是“革命现实主义”，但“革命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不然我们尽可以称之为其他什么“主义”。因此，倘要比较接近“客观性”地评价与阐释中国的当代小说，那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就应该成为批评的角度。尽管这只能是选择的一种，但这是一种相对适当的选择，因为它比较吻合批评对象的实在。

这种选择的吻合是否会导致批评个性的丧失呢？我想是不会的。因为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肤浅或简单。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与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依然是一个贫困而有待丰富与发展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一领域具有某种提供批评个性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巨大可能性。更